

■人物素描

拉泽尔竞赛理论造了一座人事经济学新大厦

□史晨晔

爱德华·拉泽尔 (Edward P. Lazear) 在美国政坛引人关注, 始于去年2月布什总统的一纸任状; 出任伯南克履新联储主席后空缺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 (CEA) 主席之职。此前拉泽尔是布什制改革小组的成员。这期间的出色工作使他赢得了行政部门的信任。

这个大耳、大嘴、光头的大个, 外表酷似典型的西部牛仔, 实为满腹经纶的大经济学家。了解他的经济学家, 无论政党派系如何, 都赞赏其精力充沛、睿智、稳健、果断; 不空谈, 立足真实世界的分析。

创立于1946年的CEA, 主要职责是向总统及高级官员提供国家经济政策建议, 只是近年来CEA在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已今非昔比。一些学者将其归因为里根时期的CEA主席费尔德斯担任。因为费尔氏屡次公开质疑白宫经济政策目标, 结果使CEA受到此后

历任总统的排挤。极具象征性的, 是原来紧挨白宫办公的CEA已搬到数个街区以外了。不过, 即使这样, CEA仍在美国国内经济政策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拉泽尔的赴任沿袭了该委员会吸收学界精英的传统。

全球顶尖商学院中有一门“人事经济学”(Personnel Economics) 的核心课程。拉泽尔是该领域的奠基人和学术领袖。1948年出生的拉泽尔, 成长于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早年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1971年获硕士学位, 后到哈佛大学深造, 1974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哈佛毕业后, 他在芝加哥大学执教, 并一直在判定美国经济周期的权威机构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担任研究员。1992年起他转任斯坦福大学, 与时任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的斯宾塞(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成为至交。早在芝大商学院任教时, 他发现, 学院的MBA们对传统劳动经济学的主题, 如劳力供需、

工会、失业等, 既没有兴趣, 又斥之为无用。而在他看来, 恰恰是经济学提供了严格的以及在许多情况下比社会学和心理学方法更好的思考人力资源问题的方法, 尤其是在人事管理制度设计上。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不完全合同等前沿理论提供了非常好的分析工具。他运用经济学方法来理解企业内部的运作管理, 不仅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也深化了管理学的直觉与描述。

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 工人的工资由其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决定。然而, 完全竞争的假设受到了市场经验的强有力挑战。拉泽尔重新考察了工资的决定问题, 主要是工资与激励之间的关系。他认为, 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着多种激励方案, 在产出易于考核的前提下, 实行计件工资具有激励员工和筛选员工的作用。当产出不容易考核, 或者可以考核但考核成本很高, 企业有必要监督投入过程, 根据

员工的时间投入来定义报酬。选择计件工资还是计时工资实际上就是在激励和监督之间选择, 在这一选择中要权衡的基本要素是考核成本和监督成本。

但如果产出不易考核、过程也不易监督, 又如何促使员工努力呢? 比如, 现在有个研究项目, 风险很大, 能否开发成功很难说, 因此难以用产出衡量员工是否努力; 而项目完成的时间也无法预定, 这意味着如果采取计时工资则可能导致研究人员磨洋工。此时, 一种可选的激励机制是竞赛; 设置一笔奖金, 在竞赛中获胜的员工可以得到奖金。这样, 企业无需监督员工的努力。工作竞赛可以通过竞争压力以及竞争压力相联系的报酬, 以激励那些行为不可观察和正常的成果出现时间难以估计的员工。如在基金产业里, 年度定期绩效评比结果与基金经理人的收益水平、未来升迁等高度相关, 驱使基金经理人为排名而战。在竞赛理论中, 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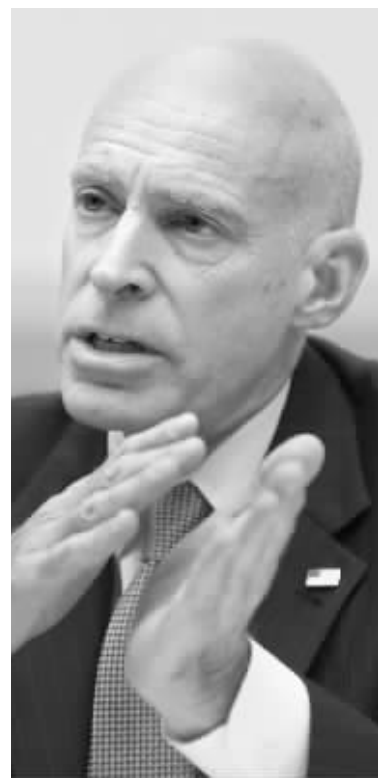
设置奖金的差距很重要。差距大小, 难以形成足够的激励; 差距太大, 又可能产生对赢取奖励行为的过度激励, 或者团队的合作行为将被竞争行为取代。拉泽尔认为, 报酬不平等(差距) 的最优程度取决于企业希望激励的行为类型以及监督绩效的能力。在个人的绩效容易考核、个人难以影响他人绩效、团队合作不重要、希望员工分担风险等情况下, 采取不平等的报酬是有好处的; 反之, 则采取平等的报酬结构将是更有利的。

竞赛理论为考察企业内的晋升激励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 与既定晋升相联系的工资增长幅度, 会影响到位于该工作等级以下的员工的积极性; 只要晋升的结果尚未明晰, 员工就有动力为获得晋升而努力工作。晋升固然可以激励员工, 但若一名员工自知今后晋升无望而变得消极时, 该怎样去激励他变得积极呢? 拉泽尔的办法是延期报酬理论: 倘若企业在员工的职业初期支付

低于其边际产出的工资, 而在员工的职业后期支付高于其边际产出的工资, 那么这种陡峭的年龄—工资剖面曲线就可能起到积极激励效果。

拉泽尔保持着广阔的研究领域。1995年他出版了《人事管理经济学》, 该书几乎囊括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所有重要问题——雇员招募、报酬结构、人力资本、流动、信号、晋升、激励、团队、福利、考评、授权等, 标志着这一领域已经基本建立起系统的理论体系。拉泽尔也因此被公认为是人力资源管理学科的开山鼻祖, 在西方学界被誉为“管理经济学之父”。

虽然也有批评人士质疑拉泽尔缺乏经济实践, 不过是一位从学校到研究所的秀才, 但拉泽尔的新任命还是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期待。有一点是公认的, 拉泽尔在理论上将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成功嫁接, 此刻他正将经济理论付诸到管理决策的实践中。(作者供职于中国银监会)



■来自日内瓦

大部分欧美人退休后仍保留贷款

□徐千惠

当逐渐接近退休年龄时, 很多人都会问自己, 是用部分储蓄来还清贷款, 以获得一种安全感呢, 还是不动用储蓄而让银行赚取利息并且让贷款继续为自己提供享受赋税减免的优惠政策呢?

如果你决定在退休后仍然保留贷款, 那你也不是唯一有这个想法的人。一项统计结果显示, 在2004年, 美国32%的房产抵押贷款来源于65岁到74岁的老人, 而接近20%的房产贷款来源于75岁以上的老人。其中25%的房产贷款是来源于自认为已经退休的人们(这里所谓自认退休的是包括任何年龄层的人群)。而在瑞士, 由于其特殊的税收政策, 绝大部分人从来不会还清房产贷款。(因为政府对个人所拥有的财产征收非常高的税, 所以如果你全部还清房屋贷款, 你就需要缴纳非常高的房产税, 但是如果你没有还清贷款, 相反, 你可以用这笔贷款来减免你的部分收入赋税。)

事实上, 取出你的养老金来偿还贷款得不偿失。让我们举个例子。假如一对夫妇拥有5万美元收入, 他们从自己的养老金计划中取出10万美元偿还贷款, 以及足够偿还额外税的资金。这两项加起来至少要再从养老金中取出13.5万美元。而且这还是假设他们超过了59岁半, 所以他们不会遭到动用养老金的罚款。别忘了, 在美国养老金偿还贷款需缴纳100%的赋税。

但如果你能在不动用养老金而每月多还一些的话, 也许是最合适的方法。在我最近看到的一份研究报告中, 经济学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如果我有额外的钱可以用于存款, 这些钱是投入养老金计划还是用于偿还贷款? 他们分析了赋税减免的优势, 以及典型的房产偿还利息和在养老账户中的存款利息这些变量之后, 得出结论, “38%的美国人, 选择提前偿还贷款, 而事实上这些人作出了错误的选择。”

我的一位老同学, 现在是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助理教授, 他的研究结论在实践中出现的更有戏剧性: 他认为有60%的人应该改变他们还清贷款而不去存款的做法。那些经济学家依赖的投资回报率预期过于保守, 没有考虑因离职后公司给你的养老金数量。典型的公司给的离职补偿是对前6%的存款给予50%的补偿。这意味着如果你存入6%的收入, 那么你会得到此外3%的存款, 相当于你的投资回报率是50%。不把这个算入, 是个大错误。

究竟是否应该早日偿还你的房屋贷款, 没有绝对的答案。正确的决定完全依赖于你的个人财务状况。但是似乎可以肯定的是, 利用养老金来偿还房贷的确不是明智选择。

■多声部

医改仍存三大弊端

刘俊(中华医学会副会长): 我国目前医改的第一个弊端就是医疗费用上涨过快, 其幅度远远超过了我国GDP的增长水平, 也超出了广大百姓的经济承受力和心理承受力。第二是医疗保障体系不完善。目前我国超过一半的人口还没有医疗保障, 就是已经有了医疗保障的人, 其保障水平也比较低。在享受医疗保障过程中, 还有很多个人风险, 在我国还存在着因病返贫的现象。第三就是服务体系目前在效率上、在公平上, 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对农村金融机构应宽准入严监管

唐双宁(银监会副主席): 在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同时, 丝毫不能放松监管。这次政策调整的目的是, 筑起农村金融新的引水之渠, 引来城市金融剩余的“甘泉”之水, 激活农村金融的竞争机制。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要注意防止三种倾向: 一是防止停留在口头上; 二是吸取当年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储金会的教训, 防止一哄而起; 三是在放宽准入的同时毫

不放松监管, 防止因放松监管而引发新的风险。

警惕通胀 未到放松时

唐纳德·科恩(美联储副主席): 尽管美国的核心通货膨胀压力近来有所减轻, 但放松对通胀的警惕从目前看还为时过早。因为, 扣除能源和食品两大类商品价格之后的核心通胀压力近来有所减轻, 这与美联储关于通胀压力将随经济降温逐渐得到缓解的预测相一致。但是, 仅从几个月的数据来推断通胀的发展趋势不一定准确。近来通胀压力减轻有可能是受一些临时性因素影响, 特别是能源价格大幅下降的间接影响。

税收激励不足制约慈善业

李怡心(天津市社会科学院专家): 税收激励并不是人们决定作出慈善捐助的原因, 但税收激励将对人们捐赠多少发挥极大的影响。在发达国家, 慈善税收优惠制度可以归纳为“一疏二堵”: “一疏”就是企业和个人可享受减免所得税待遇; “二堵”就是用巨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来限制财产转移, 促使那些富有的个人创立基金会。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利用税收杠杆促进慈善业发展的做法。(雨人摘编)

■多棱镜

民企三种“原罪”需细辨 岂可一锅煮

□邓聿文

自2004年延续至今的有关民企和民营企业“原罪”的争论, 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民粹主义氛围, 不问具体情况和是非曲直, 少有些对问题本身的理性和专业思考, 而只是简单地诉诸于一种情绪宣泄和道德评判。

具体来看, 改革以来的民企“原罪”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的改革性的探索“原罪”, 那时民企的违纪违规较多集中于对旧体制的突破; 二是90年代深化改革期, 民企的违法违规更多表现为配合地方政府推进地方经济发展而来的跟随违法, 是一种发展性的被动“原罪”。前一种“原罪”, 代表的是未来改革和发展的趋势, 可称之为“制度性原罪”。要探索新制度, 发展新的经济形式, 走新的道路, 必然要与传统的经济体制、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管理模式发生矛盾和冲突, 因此, 此种“原罪”应该得到鼓励和发扬。即使要批评, 对象也应该是地方政府。第三种“原罪”指的是一些民营企业与权贵相勾结, 利用旧

有制度和法规的缺陷和漏洞, 盗取国家财产, 侵害人民利益。与前两者相比, 同是违纪违规, 但它没有半点制度创新的作用, 只不过是把国家的财产拿来放到自己的口袋里, 变成自己的财产。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犯罪, 这样的“原罪”应该清算而且必须清算。

现在的问题是, 很多人不分青红皂白, 把这三种不同的“原罪”简单地揉合在一起, 不以历史的眼光作具体分析, 而且对于为“原罪”辩护的人, 一概斥之为民营企业家的代言人。

这种对民企“原罪”的一边倒批判, 反映了目前中国社会的民粹化倾向。所谓民粹化或者民粹主义, 指的是一种极端平民化倾向, 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 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 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

目前, 中国已经从改革前一个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变成了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的国家; 教育不平等日趋严重; 大面积腐败具有持久性特征; 大



■本期人物话语

人民币汇率弹性会扩大

周小川(央行行长): 面对国内流动性过剩局面, 不排除运用更多措施的可能性, 但必须关注当前政策工具所产生的效果。此外, 如果贸易顺差继续扩大, 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肯定会扩大。

■学术思潮寻踪

“结构主义”成就了发展经济学

□梁怡

二次大战后, 发展经济学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母胎中破茧而出, 一批致力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 在经济分析中摸索并采用了根本区别于新古典学派分析思路的研究方法, 他们再三强调从发展中国家现实出发, 尤其关注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结构中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征; 他们反对沿用以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结构为分析背景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传统, 主张创立新的研究之道。他们的治学方法后来被称为“结构主义”。

概括起来, 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分析思路所赖以建立的思想基点有三个: 对经济结构构成的分析, 对经济结构与经济现象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对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的分析。经济结构的构成可归结为两种含义: 宏观意义上经济整体所包含各部门的构成及相关变量, 例如作为主要投入品的劳动力和资本等变量; 经济部门所组成的部门结构或按某种需要所划分的经济结构。

在发展经济学家是S·库兹涅茨和H.B.钱纳里。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 S·库兹涅茨按产业结构、企业类型、劳动力职业结构、要素份额与收入的规模分布、收入的使用方式、对外贸易比例、经济结构中增长趋势的横截面等共七个方面进行了剖析。H.B.钱纳里则按积累过程(包括投资、政府收入和教育三个类目)、资源配置过程(包括国内需求结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三个类目)、人口与分配过程(由劳动力配置、城市化、人口转型、收入分配四个方面构成)这三个过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H.B.钱纳里认为, 结构构成表现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相对稳定的关系。”

在对经济结构与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分析中, 结构主义者强调经济结构是影响一国经济“深层因素”, 它决定着“深层因素”中的结构与制度等方面的刚性, 不仅会导致市场机制的均衡作用难以实现, 而且会使一国的经济构成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征。同人口增长过快有关的劳动市场二元结构被当作最常见的结构刚性; 而制度刚性主要表现在制度结构对经济发展不能做出迅速的调节, 因而使经济处于持续的非均衡状态。

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的分析, 在结构主义的分析思路中占据中心位置。H.B.钱纳里和IM·赛尔奎因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问题的权威, 从他们两人对“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的定义中可看出两层含义: 第一是“结构转型”涵盖“产业结构转变”; 第二是“结构转型”过程同

“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不可分离, 那些在“结构转型”中起作用的因素, 同样影响着“产业结构转变”。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在做结构分析时主要采用统计、投入—产出模型以及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the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等数学工具。

最早对产业结构转变进行统计研究的C.C.克拉克, 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部门中就业人数的变动入手来追溯产业结构转变, 他得出两点结论: 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 工业部门先增大后缩小, 而服务业部门不断增大; 需求和效率是促成产业结构转变的两个基本因素。S·库兹涅茨继承了C.C.克拉克的研究方法, 并对产业结构的变动原因作了分析, 论证说, 对工业、服务业的这两个部门的高需求弹性决定了这两个部门不断扩展的增长趋势, 而包括劳动力使用在内的各部门资源的使用状况部分地解释了工业和服务业扩张的原因。H.B.钱纳里将C.C.克拉克和S·库兹涅茨的研究方法作了极大的推进, 他还率先用投入—产出方法来分析产业结构的转变。

当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将“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运用于发展中国家时, 在引入新古典生产和需求函数并且把价格机制作为均衡调节变量来使用的时候, 加进了非线性方程和内生价格, 并且设定了众多的辅助性假设, 这就凸现出鲜明的结构主义特征。

选择结构分析的视角, 是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对当代发展经济学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首先, 这一研究思路推进了对现实的经济结构和具体的经济部门的研究。正如H.B.钱纳里所言, 结构主义思路的出发点在于“试图确认在发展中经济结构中的那些因素影响经济调整和发展政策选择的特殊的刚性、滞后性以及其它一些特征”。而新一代结构主义学派领军人物J·泰勒则在其著作中论定, 结构主义学派的基本假设“在于一个经济的制度以及各生产部门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决定这个经济的宏观经济行为方面起主要作用”。

其次, 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得出了有关结构政策的重要结论: 在发展中国家, 经济政策的操作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宏观与微观政策之外, 还需要有特定的同结构调整有关的结构政策。这些政策的主要功能在于减弱结构与制度刚性, 在不存在市场的地方, 促进市场中供求双方的形成, 在市场已经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领域, 进一步使市场趋于完善。